

ZHONGWAI XUEZHE LUN
《ZHANWANG ERSHIYI SHIJI》

中外学者论

《展望二十一世纪》

陈 锋 高桥 强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ZHONGWAI XUEZHE LUN

《ZHANWANG ERSHI SHIJI》

中外学者

论

『展望二十一世纪』

陈 锋 高桥 强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学者论《展望二十一世纪》/陈锋 高桥 强 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7-5622-3065-X

I. 中… II. ①陈… ②高… III. 国际问题—文集 IV. D8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3017 号

中外学者论《展望二十一世纪》

主编:陈 锋 高桥 强◎

责任编辑:刘晓嘉

责任校对:崔毅然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编室

电 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com.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姜勇华

字数:183 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

版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展望二十一世纪》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致辞	池田大作(1)
《展望二十一世纪》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若江正三(5)
《展望二十一世纪》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贺辞	王学珍(7)
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	章开沅(9)
论《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的几个观点和预言	张镜湖(20)
二十一世纪大学教育之展望	林彩梅(24)
池田大作先生的和谐理念	
——从《展望二十一世纪》解析	贾蕙萱(39)
二十一世纪的预言	
——纪念《展望二十一世纪》面世 30 周年	蔡德麟等(62)
从佛教的生命价值论看池田大作对生命的关怀	张怀承(81)
《展望二十一世纪》	
——东西睿智的结晶 文明对话的经典	冉 毅(87)
二十世纪的伦理先知	
——读《展望二十一世纪》	王泽应(96)
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	
——《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池田大作先生的生态道德观	
.....	黄富峰(103)
“战争始于人心”	
——略论池田大作的战争伦理观	曾小五(113)
池田大作教师专业化思想探微	曾 峥(126)

池田大作教育思想的特征及其思考	王丽荣等(134)
池田大作的历史文化思想	
——重读《展望二十一世纪》	陈 锋(149)
池田大作文学观多元关照	
——以《展望二十一世纪》为中心	李俄宪(159)
《展望二十一世纪》中之育儿论与节育论	高桥 强(171)
一场伟大对话的源流	
——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对话	松岛 淑(188)
汤因比与池田对谈的意义	温斯顿·E·兰格利(209)

《展望二十一世纪》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致辞

池田大作

北京大学“池田大作研究会”和创价大学共同举办国际学术论坛，谨致以衷心的敬意，并表示祝贺。

欣闻此次论坛是为了纪念阿诺尔德·汤因比博士和我的对话集中文版《展望二十一世纪》出版二十周年，光荣之至，不胜感激。

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肇庆学院、杉达学院、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的当代一流学者济济一堂，就此书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地讨论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实在是划时代的聚会。

汤因比博士已去世三十年，如果他还健在，该多么高兴啊。汤因比博士和韦罗妮卡夫人那令人难忘的温馨笑容油然浮现心中，谨祝论坛取得丰硕成果，圆满成功！

此刻，感慨萦怀，想起和晚年的博士在他伦敦那整洁的住宅里交谈的那些黄金般的日子。

对谈开始，眼镜后面总是面带微笑的博士的目光严肃起来，说：

“开始吧，为了 21 世纪的人类，让我们交谈下去！”

这句话凝聚着博士的真情。那是 1972 年，熏风吹拂、鲜花绽放的 5

月。博士八十三岁，浑身充满了沉静的热情，和四十四岁的我坦诚相对。

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恰好电视播报在英国召开首脑会议的新闻。博士看着，悠然说了一句话，至今在我胸中震响——

“可能我们的对话不惹人注意，但是将永远留存下去。”

那时我倡议“日中邦交正常化”已四年。

在东西冷战的旋涡中，各种既成势力对我的倡言施加压迫。然而，为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中国和日本非缔结友好不可，这就是我的信念。

汤因比博士非常了解我的这种行动。

他露出慈父般的微笑，说：“因信念而遭受无端的责难是一种荣誉。浅薄的指责跟本质毫无关系。我们还是谈本质问题吧。”

我们谈论的本质问题很广泛，概括起来，就是探究“何谓人”、“何谓社会”以及“何谓生命与宇宙的本质”。这就汇集成了《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本书。

博士用他那无与伦比的文明史巨眼俯瞰在薄薄覆盖地球这颗行星的“生物圈”中展开的人类史，遥望未来。

博士集毕生学术之大成所说的警世词句须臾不离我耳畔。

对于哲学告缺、迷失方向的现代世界，那些珠玑话语今天也深刻提示着根本价值观，即“为了创造新地球文明需要什么”，“为了可持续的繁荣，人类应该怎样生存”。

对谈跨越了两年，总计十天，长达四十个小时。

我曾问：“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对中国的这种悠久历史，博士刮目相看。他还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

质，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我本人曾十次访问贵国，深深感受到中国的优秀传统顺应社会变化、切合时代而改变形态，绵绵搏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性尝试，香港、澳门的历史性回归等，导向成功的动力当中也生动呈现“中华思想的优质”。

现在，贵国的胡锦涛主席领导班子所切实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有汤因比博士从贵国发现的“罕见的政治、文化性统一的技术与经验”作后盾的 21 世纪的先驱性行动。

博士一语道破，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如何能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

在这一意义上，正如博士所预见的，中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

对于我前面的提问，汤因比博士还回答：

“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

人类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复兴，这也是博士托付给我的文明课题。博士为此而提出的方法就是“对话”。

要结束对谈时，博士说：

“你年轻，希望你今后继续和世界的睿智对话，因为对话对人类融合有巨大作用。”

为兑现和博士的约定，我作为一个希望和平的市民，在全世界展开对话。

在贵国也曾和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先生、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四代领导人以及很多品智兼备的友人见面交谈。

过去丧尽天良的日本军国主义采取与对话完全相反的暴力，对文化大恩国的中国残暴侵略，一再蹂躏。这是永远不能原谅的野蛮行径。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就向日本敞开对话的大门，而且在两国邦交正

常化上着眼于“民众”，拿出“以民促官”的方针，和我们搭起了友好的金桥。

周总理的人格正是完美体现了汤因比博士视为理想领导人资质的“共生的精神气质”。

周总理曾严肃地对我说：

“为了人类和平，全世界的人应该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帮助，共同努力。”

这就是“对话”的基本精神，堪为永恒的指标。

也由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等，世界越来越瞩目中国。

汤因比博士和我一致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他若看见贵国蒸蒸日上的雄姿，一定会破颜一笑，说：“诚如我们所言啊。”

他临终留下一首“辞世诗”，这样驰思未来：

我在年轻一代，
和尚未出生的世代中，
找寻我的后继。
我将离去，
只留下对后代的关心。
它将随人类而久远，
因为，
它包含了未来的所有世代。

我也决心和会集此次国际论坛的尊敬的诸位先生一道，为了年轻一代，为了以后的世代，生命不息，就不断地加强、扩大为人类带来希望的对话潮流。

最后，由衷祝愿北京大学等大学蓬勃发展，祝愿在座的各位先生永远康泰。谢谢。

《展望二十一世纪》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若江正三

尊敬的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学珍教授，尊敬的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池田大作研究会会长贾惠萱教授，中国 8 所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研究中心的各位老师，以及出席今天会议的女士、先生们，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本次“《展望二十一世纪》与现代社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我表示诚挚的谢意。

北京的秋季如花似锦，各位嘉宾欢聚一堂，在学术上相互切磋、探讨，令人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喜悦。

正如各位所知，晚年的汤因比博士，站在批判以西欧为中心的史学观点上，认为今后应该重新认识亚洲的文明。他认为“一个地方之所以能成为文明的中心是由于宗教”，在亚洲文明众多的宗教中，他给予了大乘佛教以很高的评价。请允许我借用曾在我校任教的原和歌山大学校长角山荣名誉教授的话说，汤因比博士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是因为“在大乘佛教中，能够让人们看到超越陷入穷途末路的欧洲一神教文明、迎来的新型人类文明”。

汤因比博士一直寻求与之最能够相互探讨有关大乘佛教的人，他找到了我校创办人池田大作博士，他们在 1972 年、1973 年，在伦敦进行

了会谈。1975年人们将这次会谈的内容，用日文以《展望二十一世纪》为名出版成书，今年（编者按：即2005年，后文涉及者亦如此）恰好是该书出版30周年。

他们的这次对话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此《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也被译成多种语言，前些日子，老挝语版也出版了。至此，这本书已被译成世界上26种语言。1985年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中文版，这一年，恰好是日文版出版后的第十年。该书的中文版，同样引起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的很大反响，书中的内容在学术杂志和著述中被频繁引用，可以说这部书已是屈指可数的名著。今年适逢中文版出版20周年之佳节，为了纪念这一日子，我们策划了此次国际研讨会。

前面提到的角山教授，他有两个观点十分引人注目。其一是汤恩比博士和池田博士尽管信奉的宗教不同，但是，他们的人生观、历史观是一致的；其二，两人超越了宗教的不同，自我在“终极的存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一旦能在“终极的存在”上一致，超越宗教的不同，我们认为也就增加了对话的可读性。20世纪90年代后，所谓“文明的冲突”在冲撞中会演变为畏惧，但通过两位博士的直接对话，我认识到，文明能够共存、共生，而且这一极富说服力的理论，会流传于后人。

“挑战与应战”这一观点是汤因比博士的历史观之一。每天千变万化的现实社会，存在着各种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分歧多端。人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确信此次研讨会将对在每日应战中的我们，给予更多的启迪。

另外，在这里，我向大家通报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前些天我校的“北京代表事务所”正式获准建立。今后，希望通过这个事务所，能够进一步促进我们之间在学术、教育上的交流，更希望得到各位的理解与支持。

在此，借本次研讨会召开之际，我谨向给予了我们很大支持和帮助的北京大学池田大作研究会的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请允许我以祝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们健康幸福，事业有成来结束我的致词。

《展望二十一世纪》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贺辞

王学珍

尊敬的远道而来的日本朋友们，
尊敬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在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大好日子里，我们高兴地迎来了创价大学北京代表事务所的成立以及由创价大学和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池田大作研究会主办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此，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女士、先生为参加研讨会而光临我校表示衷心的欢迎。

创价大学是池田大作先生创立的。池田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他同北京大学有着很深的缘分。他十次访华，曾三次到北大访问、讲演，并一直关心北大、热心支持北大的教育事业。他是我们北大的名誉教授，受到我校广大师生的尊敬。他创立的创价大学是北大与日本最早建立校际交流关系的大学。至今，我校已有 30 多名教师在创价大学研修过，创价大学也已派遣近百名学生来北大留学。由于以上种种因素，我校在内地各大学中最早成立了池田大作研究会。

众所周知，创价大学已有 34 年历史，它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八王子市。教师认真治学育人、学生认真求学且彬彬有礼，校园内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创价大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国际化，它已与世界上 179 所大学有交流关系。创价大学还有令中国人倍感亲切的中日友好气氛。在它美丽如画的校园里有周恩来樱、周夫妇樱、北京大学樱，以及中国不少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樱花等等。创价大学的同学们还组织了中国研究会。在池田先生的倡导下，创价大学数十年如一日高举中日友好的旗帜，真是难能可贵。我们相信，创价大学北京代表事务所的成立必将进一步推动创价大学同北大及其他大学和学术机关的合作交流，从而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今天，在我们祝贺“《展望二十一世纪》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时，不禁使我们想起 30 年前池田先生和汤因比博士的对话。这个对话，谈古论今、说天道地、内容丰富，含义精深，涉及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是世界各国极为重视并正在企求解决的。这次的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也是对池田大作思想的一次研讨与交流。我在此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最后，祝池田大作先生健康长寿！祝创价大学繁荣昌盛！

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

华中师范大学 章开沅

(一)

20 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诚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并且或多或少提高了亿万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就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而言，人类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我们曾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则至今连绵不绝；而由于高科技用于现代战争，造成的人类生命财产损失更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恐怖时代。在这一百年中，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吸毒与犯罪率的剧增，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两方面也是史无前例的。

1968 年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以 85 岁高龄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即已对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表示深沉的忧虑。他说：“近代初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都是乐观的。这是因为，没有明确地把科学进步和精神上的进步，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他们错误地认为，累积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会自然地累积精神上的进步。……近代西欧的这种幻想，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动摇。接着，又为第二次世界大

战末期，制造和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所粉碎。长寿的 H·G·韦尔斯，他有幸看到了这种幻灭，尝到了这个苦果。因而韦尔斯以后的乌托邦理论，就变成了带有讽刺味道的反乌托邦思想，这些乌托邦理论发展到极端，就变成悲观的了。这是因为，从近代初期到 1914 年，四个世纪期间发表的乌托邦理论，都过于乐观，反而成了对于这种过于乐观情况的一种反动。”^①

汤因比进一步论述了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科学的进步，通过技术的应用，给人带来统治别人，统治人以外的自然力量。所谓力量，在伦理上是中性的，可以用于善的方面，也可以用于恶的方面。力量只是增加善恶行为所带来的实质性影响的程度。”“原子弹如果用于恶的方面，一瞬间就可以杀死几百万人。然而，人的力量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即或使用金属武器，一次最多也只能杀死一个人。相反，医学的进步给医生带来的力量，现在可以拯救几百万人免遭细菌和病毒的戕害。这同一科学力量，如果被用于细菌战，就会像原子弹一样，使几百万人丧生。如此看来，科学技术力量对人生命的影响，取决于使用这种力量的人的伦理水平。”^②

汤因比自我剖析，他作为西欧人，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施宾格勒的影响，相信 20 世纪注定人类要目睹“西欧的没落”。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其第一卷《形式和现实》和第二卷《世界历史的透视》，先后出版于 1918 年和 1922 年，正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者认为西方已处于机器控制之下，金钱主义与追求享乐成为时代的特征，因而无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其实早在这部名著正式出版之前 12 年，章太炎在《民报》第 7 号（1906 年 9 月 5 日出版）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即已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此文是对在中国风靡一时的进化论的深刻反思。章太炎并非全盘否定进化，而是告诫人们不可盲目迷信进化，把进化变成一种绝对的信仰。他认为：（1）进化终极未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2）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进化“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以

道德而言，“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从生计而言，“乐亦进化，苦亦进化”。⁽³⁾而且，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智识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善恶、苦乐亦将不断同步增长。“曩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曩时之苦乐为小，而今之苦乐为大。”这与60多年以后汤因比所说的“（科技）力量只是增加善恶行为所带来的实质性影响的程度”，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在对于现代文明弊端的批判方面，章太炎或多或少受到日本维新思想家中江兆民的影响，他在《俱分进化论》中甚至誉中江为“东方师表”。正是在20世纪初，中江怀着对文明发展前途的深沉忧虑离开人世。他在临终前发表的名著《一年有半》，颇为生动地描述了日本近世文明发展中相互伴随的两种趋向：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则是物欲泛滥、习俗败坏与社会道德的沦丧。他说：“人人都希望追求超过自己的经济力量以上的娱乐，千方百计想得到它。于是乎做官吏的人，就接受礼品及贿赂以养肥自己。经营工商业的人，就钻营奔走，投靠背景，互相勾结，寻找牟取暴利的机会。再加上日本西部的武士，数百年来，受尽了苛刻死板的法律与制度的束缚，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忽然做了大官，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好像放射出去的箭一样，急速地趋向骄奢淫逸，大大地造成和煽起了城市的荒淫和糜烂的风气，成为日本全国的吃喝玩乐的样板。从官僚资本家、富商大亨，到其余的中产阶级以下的人们，也都相继沉沦，以为这是自己的阔气。这就是现代我们日本帝国的官民上下，贵贱贫富，一般人等所以造成了奢侈、淫逸的习惯的历史。”^④

这些先贤当时都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发挥了思想先导作用。他们并非盲目地排拒现代文明，而是清醒地看到现代文明日益暴露的弊病，并且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途感到忧虑。如果说是悲观，那就是一种深沉的悲观；而深沉的悲观比肤浅的乐观，在思想境界上至少要高一个层次。

(二)

汤因比曾经寄希望于东亚精神文明的复兴，借以弥补人类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但是他却未曾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或先或后也走上了这条重物质而轻精神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且其负面影响所造成的危害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如池田大作所说的那样：“从根本上用长远的目光来看，不能不令人痛切感到现代人在经济方面，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日本人对 GNP（国民生产总值）的信仰，可称之为最。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把 GNP 的成长看成绝对的东西，以实现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为目标，然而，结果如何呢？人民始终在完全无视人性的条件下劳动，情况一直没有好转的征兆。在狭长的国土上，公害到处像火山的岩浆一样喷发出来。还有，日本产品打入世界市场，最初使人惊叹，可是最近倒不如说在加剧人们的反感。”^④ 汤因比对 GNP 的抨击更为激烈，他进一步发挥说：“GNP 连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中人们的经济繁荣程度的指标，都不能算。统计工作者用一个国家人口去除 GNP 所得的商数作为‘国民每人平均收入’，这种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把这件事数字化本身就是难以想象的错误。毋宁说，把这作为‘每人平均物质上受损’的指标，可能还有些意义吧。因为在经济上自由竞争的社会，随同 GNP 的增长而受害的分布，虽然在住宅方面是不平等的，而在空气、土地、水及其他自然环境的物质污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同等受害的。污染，无论对贫穷母亲的孩子，还是富裕母亲的孩子，都是同样有害的。”^⑤ 汤因比的批判相当深刻，但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些国家的人民并非同等受害。受害最大的还是贫苦民众，至于那些显贵豪富，无论自己国家的环境污染程度如何严重，他们却可以住在阳光充分、空气新鲜、山清水秀的佳胜地区，并且享受充分供应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各